

美日貿易本質與貿易談判之分析

彭 慧 鸞

壹、前 言

今（一九八五）年元月二日，新年假期尚未結束之際，日本首相中曾根便風塵僕僕地趕到美國加州洛杉磯，和正在家鄉度假的雷根總統會面，並進行了將近三小時的會談，會議的主題分別是：（一）美日貿易「摩擦問題」，（二）美蘇限武談判。由於美蘇兩國隨後不久將在日內瓦進行限武談判，是以限武談判問題也被列為美日高峯會談的主題之一。就時機上而言，中曾根此時對美國「衛星防衛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的構想表示支持的態度，必然可以增強美國對蘇談判的聲勢，同時對美日兩國關係的加強將有正面的效果。然而在會談中，雙方所真正關切的課題，還是美日貿易「摩擦」問題。

中曾根首相和雷根總統分別再度就任行政首長尚不到兩個月，便舉行高峯會談，一則是基於日本政府的傳統——歷屆日本首相上任後即走訪美國總統，表示對兩國關係的重視；二則與近年兩國經貿發展有關。據統計，一九八四年間，美日雙邊貿易（實係商品貿易）之差距已達三百七十億美元，再以目前兩國貿易成長的趨勢研判，一九八五年時，該項數字可能增加到四百五十億美元^①。為此，中曾根和雷根均頗憂慮保護主義有抬頭之趨勢。這對今後兩國貿易將有不利之影響，甚至有損於兩國的和諧關係。基於以上種種考慮，雙方除了在高峯會談中表示將積極設法改善外，並分別指派國務卿舒茲和國務大臣安倍，共同督促這項工作的推展。

對於演成今日美日貿易差距的原因，雙方談判代表各執一詞。就美方立場而言，主要原因是日本對其本國某些工業採行了過度保護政策，使得美國產品不易和日本產品在當地競爭；而就日方立場而言，是因為美國政府經濟政策之不當，導致政府預算出現龐大的超支，以及銀行利率升高，美元幣值因此也隨之提高，而日圓幣值自然也相對的降低。此種現象反映在國際貿易上的結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15, 1985, p. 3.

果，必然有利於日本產品在美國市場的銷售，却不利於美國產品在日本市場的競爭。

在高峯會談中，雷根提出的改進方案要求日本就以下四項產品開放市場：(一)通信器材；(二)電子產品；(三)藥材；和(四)木材類。雷根特別提出此四項的原因，是美國自認這些對它而言是具有「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產品；而四項中又以通信器材類的市場開放問題最需儘速解決。因為，日本政府不久前曾經宣佈，日本電報電話公司即將於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起正式由國營改為民營^②。這對美國而言，不失為進軍日本通信器材市場的大好時機。然而，目前日本爲了保護本國業者，對通信器材之進口，仍設有各種不同名目的非關稅限制。譬如，根據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主席佛勒的說法，美國對日出口的通信器材必須經過平均約兩年的檢驗程序，而日本同類產品在美國的檢驗却只須兩個月^③。在兩年與兩個月相較之下，美國產品的競爭力自然大爲減弱。另據資料顯示，兩國通信器材貿易有嚴重的不平衡現象。一九八四年間，日本輸美之該項產品已達一五億美元，而美國對日出口僅及一·一億美元^④。基於以上因素，美國迫切希望日本儘快開放通訊器材市場。

雖然，歷次美日貿易談判都有不同的主題，從紡織品、牛肉、柑桔，到汽車、鋼鐵乃至於前述的四項產品；但是，目的都是要求日本方面「出口自限」甚至開放市場，藉以減少雙方貿易收支的差距。儘管從國際貿易理論的觀點來看，所謂美日貿易「不平衡」是國際貿易中的必然結果，但是，實際上基於種種因素的考慮，日本方面也不得不做有限度的讓步。

回顧過去兩國關係的發展，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在派瑞(Commodore M. Perry)的指揮下，首先敲開了西方通往日本的大門，兩國並於一八五八年簽訂了通商條約，正式開啓了雙方的經貿關係^⑤。一九四〇年日本軍閥企圖向中南半島等地擴張勢力，美國遂對日本進行戰略物資的禁運，甚至凍結日本在美資產，造成兩國關係惡化，終於演成了一九四一年底的珍珠港事變，引發了太平洋戰爭；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化敵爲友，一手把日本從砲灰中扶植起來，並在經貿及防衛方面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從此，兩國又不時爲了防衛分攤和經貿問題進行磋商。

本文撰寫的主旨是從戰後美日關係的特殊性，以及從國際貿易及國際金融概念來分析兩國經貿關係的本質，再從兩國政府制度以及決策運作的差異來展望美日貿易談判的趨勢。

註② *Japan Times*, Jan. 9, 1985, p. 14.

註③ *Japan Times*, Jan. 12, 1985, p. 6.

註④ *Newsweek*, Feb. 11, 1985, p. 40.

註⑤ Edwin O. Reischauer, *The Japane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78-79.

貳、美日戰後關係之發展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日兩國由交戰國很快地成爲親密的戰友。導致如此大幅度改變的關鍵是韓戰與越戰的相繼爆發。早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韓戰尚未爆發之前，美國受盟國之託，派遣聯軍最高統帥（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麥克阿瑟將軍，負責協助並指導日本的戰後重建工作，但是當時工作的重點只有「非武裝化」（demilitariz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對於經濟方面的重建工作並未重視。直到韓戰爆發，共黨勢力在亞洲迅速蔓延，東西冷戰開始升高，美國才警覺到亞洲情勢之危急，隨即進行圍堵政策，分別與亞洲附近地區的非共國家簽訂共同防衛條約，當然也包括日本在內。除此之外，美國還大量提供部份國家經濟援助，以免共產主義在貧窮落後地區滋生蔓延，日本便是在這背景之下，獲得了美國的大力支援。

從此，爲了加速日本的經濟成長，提高經濟生產力，美國對日本進行科技支援，在貿易政策上，儘量提供優厚的待遇，使日本產品得以順利地在美國市場上銷售。然而，在西歐地區，日本却遭到排斥的命運，幸得美國從中引薦，才終於在一九六四年正式成爲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成員^⑥，至此，日本才算是真正爲國際社會所接納。總之，自五〇年代始，日本就是在美國的特別呵護下，才有日後的經濟成就。

日本在經濟成長方面固然依賴美國的支持，它在國防安全上更需要美國提供保護。由於日本特殊的地理條件，使它在先天上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日本係一島國，位居東北亞戰略要衝，北隔鄂霍次克海與蘇聯相望，西隔日本海及東海與中國大陸爲鄰，正好控制蘇聯南下太平洋必經之道，戰略地位極重要。惟其原料和市場所在的南洋地區，與它相隔却有數千哩之遙，要保障這條海線的暢通無阻，絕非日本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這般特殊的地理環境，對一個絕大部份的原料和市場都仰賴外國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項致命傷。因此，日本人深知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唯有在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的國際環境中，生存才有保障。經濟對國際間的風吹草動往往最爲敏感，以經濟立國的日本當然經不起任何國際局勢的波動。例如一九七一年發生的全球性石油危機，雖未造成日本致命的打擊，但也對日本經濟產生相當大的震撼。

因此，如何塑造一個安定繁榮的國際環境？一直是日本政府不遺餘力希望達成的外交目標。而「全方位外交」便是在此構想

^⑥ Akio Watanabe,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Affairs: 1964-1973," in Robert A. Scalapino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117-118.

之下所設計出來的策略。只不過，國際間的事務往往不是單獨國家所能掌握的，蘇聯在遠東地區的軍事擴張，使日本不得不放棄「全方位外交」的構想^⑦，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日本受其憲法的約束，已經「永遠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加上日本政府曾宣佈的「非核三原則」^⑧，結果使得日本在國防上高度仰賴美國保護。

日本地理上的特殊條件，和五〇年代東西方的冷戰，無形中塑造了美日兩國間的「不對稱相依賴關係」(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⑨。換言之，日本對美國的依賴大於美國對日本的依賴程度。在此關係之下，依賴程度大的一方「受制於對方的程度」(Vulnerability)也相對提高^⑩。就美日關係而言，此現象表現在外交問題上最為明顯。

以日本的中共政策為例。儘管日本人知道，八年侵華之戰的結果，已使中國人對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然而，日本對中國大陸的豐富資源和廣大市場却未曾忘懷。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日本便想承認中共政權，當時之所以未能如願，嗣後又遲遲不敢貿然行動，乃是美國壓力所致。當一九七一年尼克森正式宣佈「大陸之行」這項計劃時，並未事先知會日本，因此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強烈反應，即所謂的「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此事件對日本而言，雖有被輕視的感覺；但是對田中首相而言，這又何嘗不是美國給日本的一道訊息。隨後不久，他便率先訪問中國大陸，並先一步與中共建交，了却多年來的一樁心願。又以日本對外經援計劃為例，其施行對象，多半以美國的盟邦為主，如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南韓等國^⑪。雖然日本可以透過援助管道，乘機進行市場的開發^⑫，但是只要美國在政策考慮上有所變更，日本政府勢必要作相當程度的政策調整。以配合美國的利益。

從上述分析，可以獲得如下的結論：日本在經濟上的卓越成就早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項成就使得它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在國際政治方面，日本仍難擺脫美國的影響力。美日貿易雖是屬於經濟層面的問題，但實質上仍為兩國特殊的政治關係所主宰。如前所述，美日兩國間一直存在著「不對稱相依賴關係」，因此，在貿易談判時，雙方所考量的往往是政治利益重於經濟利益。這實在是美日貿易談判的一大特色。

註⑦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 20, 1984, p. 26.

註⑧ 所謂「非核三原則」即「日本不得擁有、製造或引進核子武器。見 Robert E. Ward, *Japan's Political System*,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8) p. 193.

註⑨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pp. 10-11.

註⑩ *Ibid.*

註⑪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 27, 1985, p. 18.

註⑫ Konstantin O. Sarkisov, "Japan and The U. S. in Asia—Cooperative and Contradictions," *Asian Survey*, Vol. 24, No. 11, Nov. 1984, p. 1177.

叁、從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概念分析

在科技進步、交通便捷、工商發達的今日國際社會中，國際關係所涵蓋的問題也日趨多樣化，國際經濟問題更是研究國際關係所不能忽視的課題；而在國際談判議程中，國際貿易「摩擦」問題則為最熱門的主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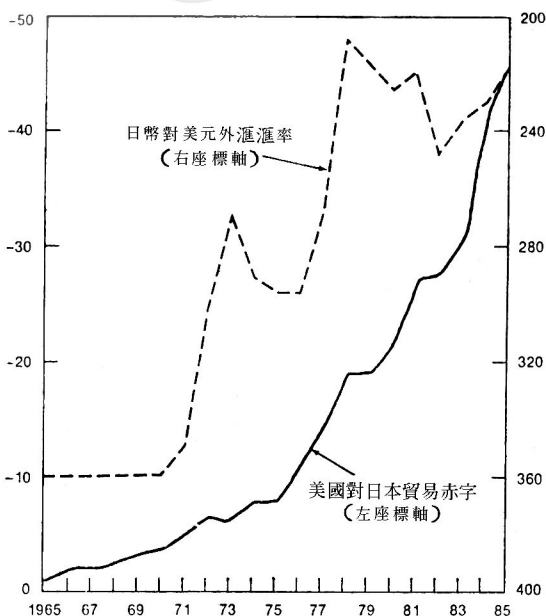
隨著貿易量的快速增長，美日兩國間的貿易「摩擦」亦層出不窮，從紡織品、彩色電視、汽車、鋼鐵、柑桔、牛肉到半導體、通信器材、藥材、木材等不一而足。爲了這些產品的銷售問題，兩國政府官員奔波於太平洋兩岸，不斷進行談判；經過多年來的努力，雙邊貿易差距並未因此而縮小，而且有快速增加的趨勢（見附圖）^⑬。

到底是何因素導致此項結果？

基本上，美日貿易有三大特色：（一）日本在其全球商品貿易（Merchandise Trade）方面多半呈現出超，而在勞務貿易（Service Trade）方面則是入超；（二）美國則在全球勞務貿易方面呈現出超，而在商品貿易方面入超；（三）美日兩國分別爲世界上該兩項貿易的最大市場，而且雙方又互爲對方最大市場^⑭。

去（一九八四）年日本對美商品貿易雖然有三百七十億美元的出超，但日本爲一天然資源貧乏的國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原料仰賴進口，因此必須大量製造產品外銷，以賺得之外匯支付進口原料費。換言之，若美國願意開放阿拉斯加原油出口，則正可以滿足日本的需要，並對美日兩國商品貿易平衡大有助益。只不過，基於政策與安全的考慮，阿拉斯加原油仍在美國的出口管制之列^⑮，因此，日本原油進口仍以「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爲主，而日本與這些產油國家的商品貿易則居於入超地位。再看美國

美日雙邊商品貿易
(以十億美元爲計算單位)



⑬ Lionel H. Olmer, "Perspective on U.S.-Japan Trade," *Business America*, Vol. 7, No. 23, Nov. 1984, p. 4.
⑭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eb. 1984) p. 65.
⑮ *United States-Japan Relations*,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Its Subcommittee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nd Trade and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97 Congress, 2nd Session, pp. 772-773.

對歐洲國家的商品貿易却是呈現出超，可用來彌補對日貿易的入超。總之，國際貿易是全球性的，只問雙邊貿易是否平衡並無多大意義。好比一個汽車製造商要和鋼鐵供應商，或是房屋建築商要和木材供應商談平衡彼此交易差距問題，是不切實際的做法。

勞務貿易和商品貿易同列為國際貿易的兩大項目，尤其在科技發達的時代，國際間科技轉移之頻繁已不亞於商品交易，經由科技轉移所賺取的各项報酬均列在勞務貿易帳下，因此雙邊貿易是否平衡，仍需將勞務貿易的收支一併計算。戰後初期，日本爲了恢復國內經濟，先後以技術契約和資本自由化等方式向工業先進國家引進技術^⑥。美國的科技發達，再加上一向對日本經濟成長的輔助，使得美國對日本科技轉移也成了兩國貿易的主要項目，也造成日本對美勞務貿易呈現巨額入超。最近幾年，日本在科技成就上雖有後來居上之勢，但尙未能夠扭轉此項貿易入超的現狀。

再從國際金融角度來分析美日貿易問題，美元幣值成了爭論的重點。通常匯率的波動和國際情勢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國際石油價格漸趨平穩，帶動全球經濟復甦，同時，美國也因為退出越戰而使國內經濟恢復景氣，結果連帶刺激了貿易伙伴國的經濟快速成長，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量因此激增，美日兩國的貿易量也因而快速成長。所以，若要將美元增值歸咎於美國政府未能控制其龐大的預算赤字是有欠公平的。按經濟學的理论，市場的供需情況決定價格。美元的增值是由於國際市場的需求量大；而需求量之大小又與美國是否國力強大、經濟穩定有關。由於國際間對美國有強烈的信心，美元便被一致看好，需求量大增，幣值自然升高。換言之，美金價格的高低取決於國際市場的因素多於美國國內的因素。

就上述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觀點而言，美日兩國對貿易「不平衡」的解釋皆有欠理論基礎，而且失之偏頗。美日貿易是國際貿易運作的一環，兩國貿易的差距事實上是一種常態。然而，儘管理論上是如此，實際上雙方談判代表們仍不厭其煩地進行磋商，主要是因爲日本的保護政策已經引起了美國國內的強烈反感^⑦。本來，各國爲了保護本國的「幼稚」工業，對外實施進口設限，是無可厚非之事。然而，倘若保護過度，引起外國不滿，甚而導致以立法採取報復行動，則必有違保護政策之初衷。雷根和中曾根的會談就是着眼於此，希望借磋商來緩和國內保護主義的壓力。

美日貿易談判的表面是要解決貿易差距問題，但是談判的過程和結果却深受兩國「不對稱相依關係」和不同的政府制度所影響。以下再就兩國政府制度以及決策運作的差異作進一步的探討。

肆、美日政府制度和決策運作之比較

註⑥ 葉英敏著，「日本技術引進及技術進步之研究」中華經濟研究院專論，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頁十。
註⑦ *Japan Times*, April 9, 1985, p. 14.

各國在做外交決策時，首要考慮到的就是國家利益。而在國際事務日漸多樣化的今天，國家利益所包含的範圍也在擴大。以往被視為「低層次政治」(Low Politics)的經濟問題^⑩，近來已普遍受到重視，其中經貿問題更早已成為國際談判的主要議題。基本上，經貿問題與一般民衆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因此必然與國內政治發生密切的關係，美日經貿問題自然也不例外。兩國政府有鑒於貿易談判將引起國內的政治迴響，在問題的處理上不得不格外謹慎。

日本國內政治的特色之一，便是自民黨的長期執政，以及黨內山頭林立的派系之爭^⑪。衆派系之間又以田中派的勢力最爲雄厚，而現任首相中曾根就是依靠田中派的支持才能順利當選^⑫。不過，近幾年來種種跡象顯示，田中派的內閣已使得自民黨內派系間的權力平衡再度面臨考驗^⑬，在日本政壇中始終未能成爲氣候的社會黨，已經積極地在爲國會改選下任首相作鋪路工作^⑭。面臨著執政黨本身的「內憂外患」，中曾根內閣在這任內將是任重道遠，任何政策上的成敗都將影響到自民黨執政的命運。日本是以貿易立國，而美國又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美日貿易對日本而言，自然是最重要的問題。如何在不損及兩國關係的同時而又兼顧到國家利益，是自民黨必須小心處理的課題，更是中曾根內閣所必須解決的一道難題。

美國雖然和日本一樣，同是政黨政治，但是民主、共和兩黨在歷屆選舉中，互有勝負、交替執政，並沒有類似日本自民黨內派系明爭暗鬪的現象。尤其是四年一次的大選對一個在位總統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也比兩年一次總裁改選對一位首相爲小。此外，美國國會對行政部門的壓力亦不能忽視。依照美國憲法規定，任何一項法案都須經過參衆兩院通過才能正式成爲法律，即使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享有拒絕簽署的權利，但是該法案如獲國會重新考慮，則只需兩院三分之二以上議員支持，仍會自動生效。換言之，總統行政權雖大，仍將受國會的牽制。而在此次美日貿易談判的問題上，美國國會就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其中以密蘇里州參議員丹佛斯(John Danforth)和奧克拉荷馬州參議員伯仁(David Boren)鼓吹對日本進行貿易制裁最力^⑮。同時參院在

註⑩ Keohane & Nye, *op. cit.*, p. 24.

註⑪ 日本是採行內閣制的國家，因此首相通常由執政黨領袖擔任，因此，在自民黨內部，各派系經常爲了總裁人選的提名而明爭暗鬪。依照自民黨綱規定，總裁一職兩年改選一次，因此派閥間的權力鬪爭是經年累月的。

註⑫ 長久以來，田中派就是自民黨中的主流派，換言之，只要是田中所支持的總裁候選人大多都能順利當選。

註⑬ 雖然洛克希德賄賂案使得田中的個人聲望大跌，但是他在自民黨內的政治影響力猶在，直到去年十月總裁改選時，鈴木善幸推舉現任自民黨副總裁二階堂進與中曾根共同角逐總裁一職，當時若非二階堂進自願退出，極可能釀成自民黨分裂。又最近大藏大臣竹下登因不滿田中屬意二階堂進角逐下任自民黨總裁，乃另立門戶組織了「創政會」，以有別於田中派的「木曜會」。再加上田中本人目前體弱多病，因此田中派勢力正面臨嚴重的考驗。

註⑭ *Japan Times*, Jan. 13, 1985, p. 1.

註⑮ *Ibid.*, Feb. 3, 1985, p. 5.

三月廿八日曾以九十二比零表決通過一項決議，促請雷根總統以關稅及配額方式限制日貨輸美，除非日本對美國產品開放市場^②，而在衆院也通過了類似議案。此外參院財政委員會還通過法案，若九十天之內日本未能提出有效的貿易自由化政策，將促請雷根對日貨採取必要措施^③。

美日關係一向是日本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而中曾根本人對加強美日關係更是不遺餘力。如何維持兩國關係是自民黨的重要課題，對中曾根本人甚至是一項個人職志。自一九八二年就任首相以來，中曾根曾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堅定地表示其親美的政策。一九八三年初首次訪美時，他就曾公開地將日本比喻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語中含有強烈的美日軍事聯盟的意味。除此之外，中曾根對增加國防預算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以上，也明白地表示了努力的決心，這些都是美國朝野所有目共睹的，至少在雷根的心目中，中曾根個人的努力是被肯定的。這點可從此次會談中，軍費問題未被提出討論上得到證明。

儘管中曾根個人與雷根之間有深厚的友誼，但是美日貿易問題仍有賴內閣大臣們的進一步磋商。日本外貿的主要決策部門是外務省和通產省。由於日本是經濟大國，通產省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外務省。一般而言，外務省的決策多偏於「國際取向」，而通產省則比較偏於「本國利益取向」，或許稱之為「商業利益取向」更爲恰當。因此，美日貿易談判時，外務省的立場是以「維繫兩國和諧關係」作爲優先考慮，而通產省則不輕言讓步，態度比較強硬。因此在談判進行之中，日本方面免不了會面臨內部協調的問題。

由於美國是採行總統制的國家，同是一國之行政首長，和中曾根比較，雷根所能掌握的實權比較大。就外交決策而言，美國總統只需會同其行政辦公室內要員以及業務有關的閣員共商對策即可。由於這些成員多數是總統親自任命，只對總統提供參考性意見，並不干涉總統的最後決策^④，換言之，決策過程中受到業務本位主義干擾的程度較小。就外貿政策而言，美國總統經常共同研商的對象包括有國務卿、財政部長、特別貿易談判代表、白宮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經濟顧問委員會等。以今年初開始的貿易談判爲例，雷根所陸續派出的對日談判代表包括了國務卿舒茲、財政部長黎根（現任白宮幕僚長）、特別貿易談判代表布羅克（William Brock）以及前不久才前往日本的國家安全會議亞太事務顧問西格爾（Gaston Sigur）等，分別以總統特別貿易談判代表的身份和日本外務大臣安倍或通產大臣村田以及其他有關大臣進行磋商。很明顯地，美方代表在談判時往往比較能堅定立場，再加上國內的輿論做後盾，在聲勢上就已先占上風，使得日方不得有所讓步了。

註② *Ibid.*, March 29, 1985, pp. 1 & 7

註③ *Newsweek*, April 15, 1985, p. 18.

註④ 王世憲譯，幼獅翻譯中心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內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六年）頁二〇—二二。

從上述的比較分析，不難發現，美日政府制度的不同，形成兩國在決策運作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影響到談判雙方討價還價的能力 (bargaining power)、談判進展的速度以及最後的結果。

伍、結 論

戰後美日關係之發展一直是處於一種「不對稱相依關係」。雖然從經濟成就上來看，日本有足夠的資格作為美國的「平等伙伴」 (equal partner)，但因在國防安全方面仍然高度依賴美國，故尚擺脫不了「次要伙伴」 (junior partner) 關係。

就目前的發展看來，日本在外交決策過程中，除非是不直接涉及兩國利益的國際事件，仍須考量美國的可能反應。尤其是美日經貿關係這一敏感問題，一直為美國朝野所關切，日本政府雖一再為兩國貿易差距的發生做自我辯護，但實際上却不得不應美方的要求，做開放市場的努力。今年四月九日中曾根內閣所宣佈的市場開放新措施^②，正是美國朝野強大壓力下的產物。儘管一般看法認為，日本的「新措施」是重施故技，無補於貿易差距之解決，但是中曾根所提出「每人每年購買一百美元的舶來品」的口號，却也可以收到緩和緊張經貿關係的效果，因為整個事件的重點仍然在於其所蘊含的政治意義。

不論是中曾根或雷根政府，在處理美日經貿問題時，都必須考慮來自國內政治的壓力。由於國際貿易是一個敏感又難以擺平的問題，如何在政治上緩和兩國緊張關係，才是雙方談判的核心問題。

基於兩國政府制度和決策運作上的差異，雷根政府對中曾根內閣將會有限度的施加壓力，使中曾根在面對國內政治壓力的同時，又能逐步對美國開放市場。同時對美國政府而言，中曾根是日本歷任首相中，難得一見的友美派，因此格外珍惜這份關係。為了使中曾根內閣乃至於自民黨能長久執政，雷根政府在施加壓力的同時，更得有所斟酌，適可而止，否則將會得不償失。總之，未來美日貿易談判仍將在兩國既有的「特殊關係」的基礎上發展，日本逐漸對美國開放市場是必然的趨勢，只是基於政治等因素的考慮，在速度上將不會太快。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國際組助理研究員)

(完稿於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註② Japan Times, April 10, 1985, p. 1.